

# 结构在过往,展示当下青年力量

□潘凯雄

从去年开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开始陆续推出由杨庆祥教授任总主编的“新坐标书系”,据编选方和出版方介绍,这套书系旨在全面展示当下青年写作的力量,兼具可持续性跟史料研究价值。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跟价值的编选跟出版工程。

所谓“坐标”本是一个数学名词,指的是能够明确标示在直线、平面或空间位置的一个或一组数的那个点。现在这套以文学作品为主体构成的书系既然借用这个数学名词并在前面冠之一“新”字作为自己的总命名,我想总是应该充分考虑了构成“坐标”的诸要素。

丛书总主编杨庆祥在为这套丛书撰写的后记中已为此基本一一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那“一个或一组数”即是以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代表性作家为主体,所有的编者都是出生于80年代以后的青年评论家跟文学博士。而所谓“新”则是以时代、文学跟经典这三个要素为内涵,并作为那“一个或一组数”所在的“直线、平面或空间位置”。

这样的定位当然是清晰的,如果说我还有点不太确认的地方,那就是现在就将“经典”二字纳入“新”的范围,是否还有点为时过早。尽管距离入选丛书的某些作品的面世时间也过去了20年左右,但就入选丛书的这些作家整体而言,似还远不到“盖棺定论”之时,最终能否成为“经典”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当然,面对这套颇有价值的书系一上来就如此挑剔确有吹毛求疵之嫌,还是先回到从书自身为好。

首先,这套“新坐标”确有编选出版的充分理由跟足够价值,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打开放宽至新时期伊始,便更可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放眼新中国文学,以1978年为起点至80年代末或90年代上半叶为止的新时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时段。活跃在这个时期文学舞台的作家其实是由自20世纪初至60年代出生的几代作家共舞,他们共同上演了新时期文学繁荣跟辉煌的这台大戏。对这代作家的研究虽然还处于进行时,但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跟基础。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登上文学舞台的70、80两代作家,其中虽有少数也曾“折腾”得风生水起,但对他们的研究,无论是总体还是个体则显然不足。特别是在当下,这批作家大都已构成文学创作之重要力量,有的其实也已步入中年。因此,对他们加以集中的观察、理性的研究不仅恰逢其时,更确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讲“新坐标”的编辑跟出版的确值得足够的重视跟关注。

其次,从已公开出版的部分“新坐标”看,每本大体由代表作品、相关重要评论选、创作谈跟自述、访谈跟创作年表这五个部

分组成,尽管每种的各自比重或存有参差不齐之遗憾,但总体上对一个作家进行研究的要件则是完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对一个作家展开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基础性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坐标”看上去似乎只是某位作家创作成果的一个集结或一种浓缩,实际上更重要的价值则在于提供了为之展开科学研究的基础模板。其中除创作年表是做学问的基础工作与硬功夫外,其余四个部分的选择以及访谈时所提出的问题本质上则是考验选家自身能力如何的试金石。这样一种结构在过往的归集性选本中不多见,也是这套丛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最后,编纂这套书系在总主编杨庆祥心中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依此建构“原创性理论的创造”。他谈道:“‘五四一代’借助启蒙跟国民性理论,‘十七年’文学借助‘社会主义新人’理论,‘新时期文学’借助‘现代性’理论比较自洽地完成了自我的经典化跟历史化。那么,这一代人的写作需要放在何种理论框架里来解释跟丰富呢?这是这套书系的一个提问,它召唤着回答——也许这是一个‘世纪的问答’。”这样一种良好愿望我当然是理解的,但我也有一点确不如杨教授自信的地方。无论是“五四一代”还是“十七年”抑或是“新时期”,看上去似乎确是在用“一句话”或一种概括“比较自洽地完成了自我的经典化跟历史化”。但这真的就是“原创性理论的创造”吗?又真的就是“比较自洽地完成了自我的经典化跟历史化”吗?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判断是有所怀疑的。在我看来,这样的“一句话”最多只是一种时代背景的省略性描述,远不足以称之为“原创性理论的创造”。如果说过往的历史局限产生出这样的结论,我是可以理解的。但经历改革开放40余年后,基于全球化视野的考虑,当下我们是否还应该认同这种意见,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做这样的努力?

我当然支持在新的文学实践面前,比如面对“70后”“80后”的文学创作实践,做一些“原创性理论创造”的探索跟建构,这完全应该,也必须去做。但这种“探索跟建构”一定不是那种诸如“多样性”“多元化”之类大而化之的、一句话式的概括跟描述,而应该是具体的、实在的、丰富的。背景的描述固然可能适当抽象跟概括,但具体到一个时代中作家的个性研究、作家间的比较研究则一定是充分个性的、鲜活的,不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跟描述的。如果说这也是“新坐标”这个空间中的元素之一,那一定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群不同的“组”。

“新坐标”的搭建还在继续行进的过程中,我在充分肯定它独特贡献的同时,也不揣简陋地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目的只是为了这新建构的“坐标”更加周密跟精准。

2012年的时候,我与杨庆祥、黄平蒙张燕玲老师信任,在其主编的《南方文坛》上开设专栏“80后学人三人谈”,后集结为《以文学为志业》出版。彼时的谈话文字,不少围绕我们这一代际的文学展开,或将历史经验跟自身行迹、心迹相参照。

当时我的忧虑是,“80后”最初的崛起,毫无疑问借助了网络跟市场这两股强大的推动力。网络不仅指向发表的媒体(以前是文学期刊),而且直接影响到文学写作、阅读跟评价的形态,这样一种近乎畅销书式的生产流通方式,跟先前“作协—文学期刊”的体制有很大区别,也固化了人们对于“80后”文学的印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专业读者跟研究者并不太在意“80后”文学,与此同时,年轻的作家在传统体制之外自生自灭。当然,传统体制之外别有天地跟生机,但要么无人问津,要么在与媒体包装、市场逻辑的周旋中气血耗尽……十年横忽而过,终于等到杨庆祥主编“新坐标书系”横空出世,以学术化的眼光对“70后”“80后”的创作业绩进行存档、整合跟研究。目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已推出该书系中的14种,每位作家单独成卷,每卷皆以作品选、评论、创作谈、访谈跟创作年表构成体例。

更上层楼的是,杨庆祥在总序中提出“原创性理论创造”的迫切性,迄今依然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对这一代青年作家的文学密码跟审美风貌进行把握跟提炼。近年来,杨庆祥提出的“新伤痕”、黄平梳理的“反讽传统”,其论述容或可商,但无疑是理论创造的可贵尝试,见《“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反讽者说》等相关文章。举一例以作对照:程光炜教授曾向研究者推荐《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跟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这是李敬泽、李洱、邱华栋等几位前辈在1990年代推出的一本对话录,对话围绕的主题就是他们这代“60后”人的文学。我发现,当年他们努力辨析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个人化写作”“日常生活”等,从今天来看,不但已经成为描述那代人美学经验的标识,而且进入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概念”。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一代有一代人之文学”的指认,往往都是通过一两个精准而有效的关键词来落实的。上引对话录中有作家的自我说法跟批评家的强力阐释,精诚、有效的“集体作业”正是一代人推开

# 以学术眼光整合青年世代的创作实绩

□金理

经典化跟文学史殿堂大门的尝试。与此对照,这些年来年轻且不乏实绩的作家崛起于创作领域,文学批评跟文学理论则严重滞后。

“新坐标书系”每卷所收录的评论文章,既是指对作家的代表性研究,也在聚焦时潮背景的现象分析之外,更多以作家作品论的方式去体贴作家个体的特殊性以及具体文本内部的美学肌理,在这个基础上,将审美跟社会、作家作品跟历史语境等信息内外呼应、结合起来。它们无疑构成了杨庆祥所召唤的“原创性理论”诞生的论述积累。

以学术眼光整合青年世代的创作实绩毋庸置疑是好的尝试,但学术眼光本身也暗含不同的评价标准。“新坐标书系”是为具备经典潜质的作家备下的聚义厅,抑或同时考虑文学对普通读者、大众社会的辐射跟介入?困难在于,实际影响、塑造着社会中广大人群对于文学之理解跟想象的,未必是能够进入聚义厅上的文学英雄座次。

我们常说19世纪40年代是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的时代,可是据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中提示:现在留存下来一些当时书店里的畅销书榜跟最受欢迎的作家名单里,并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光辉灿烂的名字,而榜单上实际出现的作家,今天的我们全都不认识,而当年他们的读者,可“不只是堕落的穷人,那些‘出身良好的’人”也有此嗜好,至少是在乘火车旅行途中。这些作家尽管进入了文学史,但是我们却想要理解当时人对文学的想象,其实离不开这些现在看起来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类比到我们身处的时代,如果要理解今天的人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庄严肃穆的大学课堂、研讨论坛、主流奖项跟经典选本等当然不能忽略;但是也不妨将目光转向人流拥挤的飞机场、火车站,我们是不是想过,哪些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会出现在上述地点的书店内。由此,我也一直非常想处理一项课题:飞机场跟火车站里的当代文学面孔。

“新坐标书系”目前推出两辑共14位作家分别是:李修文、鲁敏、葛亮、徐则臣、张悦然、双雪涛、乔叶、张楚、李宏伟、石一枫、赵志明、笛安、刘汀、杨庆祥。以上罗列是为了从遴选出的对象来反推该书系的评价标准。这套选本,是客观保存原貌跟现场(应收尽收),抑或体现自身学术眼光(设定门槛、实现筛选)?

这两个标准并不能清晰区分,但从实际操作而言,“新坐标书系”无疑更偏向后者。其实杨庆祥在总序中已有说明:“这套新坐标书系里的‘青年世代’指的是那些在我们的时代创造出了独有的美学景观跟艺术形式,并呈现出当下时代精神症候的作家。新坐标者,即新时代、新文学、新经典之涵义也。”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那些在创造艺术形式方面可以推敲,却实实在击中当今时代精神症候之一斑的作家如何取舍?更何况,在豆瓣等网络平台上风生水起,经受住类型文学、网络文学的大浪淘沙(例如马伯庸),甚至更隐秘一些围绕若干独立出版品牌跟文艺同人圈……上述阵地上都不乏艺术形式上苦心经营又对时代真问题有所发现的青年

作家。杨庆祥同时主编过“青·科幻”丛书,且“新坐标书系”的分卷主编皆为身居批评一线的青年学人,身处新媒体普及、发表阵地多元的环境,在后续编选过程中,他们一定会将对具备探索精神的文学新人的发现、对“传统”“主流”视野的反省,有效整合到文学史叙述版图中。我们拭目以待。



# “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

□陈泽宇

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问世,以总序、导言、选本相结合的方式归拢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代表性作品,涵盖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文体特质、理论主张等诸多方面。作为有组织的系统性文学建制,《大系》通过大型文学选本的架构,重新估量了文学史的尺度,给同时代的文学史观提供了启迪,也形成了自身的限度。

《大系》显露出文学史书写跟出版传播的必然性滞后,暂定的文学史框架永远无法满足创作现场的变动,文学共识达成之时就开启了自我的衰败,文学的更新总要以文学史的分裂为代价。现代文学第二、第三个十年的创作实绩证明了文学的发展就是同文学史观的潜在博弈。

这种潜在的博弈在新时期之后愈发明显。十余年里,如雨后春笋般的创作洋溢着非凡的活力,“多元化”向“一体化”的挑战至少表面上成功了。顶着“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告诫,文学史不无艰难地赋予了这一时段的文学以“伤痕”“反思”“寻根”“先锋”等不同面孔,它们余光或延长线交叉在一起,又吁请出杂花生树的文学意义上的“漫长的九十年代”。作为历史理性的外壳之一,文学史的叙述冲动终于遭遇了疲惫,文学风格的迁徙跟时代社会的迁移异质同构,一时间让创作找不到自己需要博弈的对手。在文学史观短暂无的不应期里,创作实践已经飞快地超出了既有的文学概念框架,言说的乏力开始凸显。

如果说,在“漫长的九十年代”里最先崭露头角的“70后”一代,是没有博弈对手的创作,那么很快,连同迅速登场的“80后”一代作家一起,发现了创作博弈的对手竟是自己。曾经对弈的另一端,文学史或文学史观从一个巨大的概念坍塌到个体身上,又或者是在更广阔以致精致的,那些层叠的、本质化的历史想象力弥散在写作者的周

围,等待被文学的感知力捕获。

每一位写作者的感知力都独一无二,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从“漫长的九十年代”到新世纪,我们触碰到林慧聪对“大雪封门”的渴望(徐则臣),领略着风自南来的“文化中国”(葛亮),疑似于被“茧”层层包裹的雨夜(张悦然),窥伺如同六面棱镜一般的“六人晚餐”(鲁敏),驯养充满迷途色彩的现代东北乡愁(双雪涛),结识一个个与山河因顿作战的漫游者(李修文)……每一位青年作家都以独特的个体感知力继续着历史性的博弈——从自己身上战斗,“创造出了独有的美学景观跟艺术样式,并呈现出当下时代精神症候”。新文学自这一代作家开始,就有了真正的大不同。因为他们所博弈的对象是自己本身,所以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有十字街头,但不是“荷戟独彷徨”的旧文苑,而是新的坐标,是关于“文学”的坐标,不是特定的“某类文学”的坐标,是面向21世纪的无穷远方跟无尽人们的新坐标。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何为“新坐标”,以及“坐标”何以成为“新”,自然就能够理解“新坐标”书系编者的细致精心:“新坐标者,新时代、新文学、新经典之涵义也。”这套2018年开始策划、2021年完成第一辑第一批出版的大型丛书由杨庆祥主编,数十位青年批评家、文学博士担纲分卷编者。该套丛书网罗整个当代文学“70后”“80后”青年作家的创作实绩,计划于5年内出版50种。与《大系》初创的时代不同,而今描述文学发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从构建文学史框架到文学批评的过渡,故“新坐标”书系的编选体例也做了明显调整。

《大系》以特定的编辑意图承载文学史观,在此基础上,按时间纵轴选取作品,以文体分卷;“新坐标”书系则重在呈现具体文本,以及作家的写作行为跟写作姿态,选择在精神美学跟社会实践层面上均能提供重要文化现象的文本,并以作

家分卷。“新坐标”书系每卷注明著者、编者,在展现著者写作脉络代表作品的基础上侧重遴选创作谈、评论选、对话录等。显然,“新坐标”书系突破了新文学既有的文选编辑方案,实现了原作再现跟文本解读的融合,打通创作跟批评的分隔,将可供参考的批评文本融入书系之中,避免了传统选本仅有文学阅读的单调,也使书系兼具了研究资料的效用,体现出更鲜明的选家策略。此外,“新坐标”书系还在每卷最后附有编者整理的作家创作年表,这一巧思既将作家从处女作到近作的全部文本,以时间为序加以存目,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又特别收纳了易被忽视的作家评论、随笔文章。许多时候,写作坐标的选择、确立、位移、滑动都在这类文字中得以体现,作家的评论跟随笔文章不仅可见其文学趣味跟精神资源,而且更能露出虚构世界背后真实之“我”的冰山一角。“新坐标”书系的编选从最大限度上丰富了研究者的阅读视野,展现出编者扎实的史料意识跟不俗的文学眼光。可以说,“新坐标”书系是一部大型的文学作品集,也更是一次具有创见的文学批评行动。

与文学史观的疲软情况相仿,文学批评也一度因为缺乏知识跟思想的准备而自食苦果,对当代文学的现场失去概括跟描述的能力。文学批评在学院化的时代背景下必然走向学科化跟专业化的过程,只不过,对于当代文学领域来说,不同门类的批评方法借由理论的一次次旅行制造出来,机械化的理论模式被反复套用,压抑了原创性文学理论跟文学经典的生成。我们曾经历过一个理论繁荣却空转的批评年代,这种现象在近两年间有所好转,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对当代文学经典坐标的体认跟判断中,《小说评论》的“重勘现象级文本”、《四川文学》的“经典的十二种凝视”、《作品》的“经典70后”等栏目均从不同角度做出尝试。“新坐标”书系的编选出版同样可以视

作这一时期对当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探索,其所收录的批评文本,多为亲切可感的细读文章。

编选者有意识地考虑到一套活的书的可阅读性,避开了架床叠屋式的陈腐论述,足见编者的批评远见。更具卓识的是每卷中的对话录部分,这些以著者跟编者访谈为主的文字,用更为生动跟笃定的问题意识完成了文学批评的再造,堪称全书的点睛之笔。部分卷本的书名即以对话录的题目标名,比如徐则臣著、樊迎春编《信与爱的乌托邦》以及双雪涛著、李雪编《侦探·工匠·小说家》等。

“新坐标”书系第一辑第二批的八卷作品也即将问世,它们分别是乔叶著、魏华莹编《在这故事世界》,张楚著、朱明伟编《抒情的创造》,刘汀著、徐刚编《夜宴》,笛安著、樊迎春编《光影之外》,李宏伟著、陈若谷编《哈瓦那超级市场》,石一枫著、李屹编《三个男人》,赵志明著、李社编《娱石中》,以及杨庆祥著、唐伟和刘欣明编《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不难发现,书系的人选著者都创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并仍在以旺盛的精力参与着新时代文学形态的塑造。他们不是已经定性的文学典型,而是不断代谢跟更替的文学脉搏。脉搏是变动不居的,它看似很难跟进,但其实不是。正如书系主编杨庆祥所说,他乐于跟文学现场共舞,如果感到舞池变化的节奏太快,那是因为批评者尚未真正进入舞池;如果“永远都在岸上,永远不去舞池,那就会永远跟不上变化,你就会觉得离现场跟纵深是多么遥远,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你离历史是多么遥远”。杨庆祥说,大部分批评的从业者会慢慢转身,回归到“凝固的、静态的”、安全的范畴里,但这不是他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要去跳舞。”这种批评观贯穿着整套“新坐标”书系的编选,抑或说这就是一套“同时代人”的舞台之书,对经典坐标的厘定

从批评家跟作家的舞步中展开。早在2015年,杨庆祥在他主导的“同代人”微信公众号的创刊词里就已经明确:“我们从这里出发理解自我,通过文本重建主体跟时代、主体跟世界的关系,也由此走向无尽的‘同时代人’。”

当然,文学现场的确正在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当我们用“变化”来描述“文学”的时候,会条件反射般地指向文学的内容,不过,更重要的变化关乎“文学”本身。我们理想中的文学如何在智能媒介跟视听文明的时代获得意义,完成自赎?恐怕文学的“坐标”将从个体身上挪动到他处,批评的坐标也将被改写。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谈论的“新坐标”或者“新新坐标”“后新坐标”的陈述方式将来也难逃命名的窠臼。杨庆祥在书系总序中引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结尾,“喧嚣嘈杂之声已然沉寂,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的确,每代人自有文学的安排,去跳舞,去注视。但如何去跳,又如何去看呢?我发现这首诗后面还有极具象征意味的两句:“朦胧的夜色正向我对准,用千百只望远镜的眼睛”,或许可以作为我对“新坐标”丛书的评价。

